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THOMAS C. SCHELLING

军备及其影响

ARMS AND INFLUENCE

[美] 托马斯·谢林 著 毛瑞鹏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THOMAS C. SCHELLING

军备及其影响

ARMS AND INFLUENCE

[美] 托马斯·谢林 著 毛瑞鹏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备及其影响/(美)谢林(Schelling, T. C.)著;
毛瑞鹏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 Arms and Influence
ISBN 978-7-208-09709-4

I. ①军… II. ①谢… ②毛… III. ①军备-控制-
研究-世界 IV. ①D8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6945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

军备及其影响

[美]托马斯·谢林 著

毛瑞鹏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5 插页 4 字数 216,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709-4/D·1824

定价 32.00 元

丛书总序

纵谙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熟谙兵法,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断决策,机智善辩,纵横捭阖。《战国策》、《孙子兵法》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现代中国战略家当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思想,至今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

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命运,国家之间相互隔绝、按照军事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大大丰富了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的外延与内涵。军事战略仍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传统国

家安全也仍然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虑。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霾的消散,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危险的降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经济竞争加剧了,全球范围的贫富悬殊扩大了,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离开对上述关乎国计民生的功能性、全球性、跨国界问题的研究,今天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国际战略必须同国家发展战略一起谋划,同步执行。

但是,对具体问题包括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取代国际战略研究。应当看到,全球化越向社会纵深发展,国家利益越多元化,内外政策互动越紧密,形成“大战略”的迫切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历来是由其最高决策者来制定的。但是,同过去“伟人时代”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部门在参与国际战略的制定,而任何一个部门都有其视角上的局限性。

战略需要综合分析、全局观念、长远谋划、协调执行,也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对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来说,我们施展才学的舞台越来越宽阔,但知识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古今中外的纵向韬略经纶需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全球横向新问题有待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国际战略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我们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本丛书将本着开放、包容、谦虚、严谨的学风,寻觅国际战略领域的精品。尚拜求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惠赐宏论巨制。

王缉思

2008年新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前 言

人类生产的一条可悲规律是：破坏总比创造容易。一座需要几个人花费多年的时间才能造好的房子，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被任何买得起一盒火柴的违法少年所焚毁。毒死一条狗要比喂养它所需的花费低廉得多。一个国家使用价值 200 亿美元的核武器所造成的破坏，要比它用同样数量的对外投资所创造的财富大得多。人们或者国家能够造成的危害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这种危害常常被用来引起他人的注意。

伤害性力量(the power to hurt)——毁坏他人珍惜的事物，使其遭受伤痛和悲哀的纯粹非获得性(acquisitive)、非生产性的力量——是一种讨价还价的交易力量(bargaining power)。运用这种力量并不容易，但是人们还是经常会使用它。在黑社会，它是敲诈、勒索和绑架的基础；在商业社会，它则是抵制、罢工以及封锁工厂的依据。在某些国家，它通常被用来胁迫选民、官僚甚至警察；它构成了社会通过精神以及肉体的惩罚慑止犯罪和违法行为的基础。同时，它也具有非暴力的形式，例如造成混乱或收益减少的静坐抗议；它还具有一些更加微妙的形式，比如通过自残使他人感到负疚或羞耻。甚至法律本身也会被用作伤害性力量。例如，从古代雅典开始，人们就已经通过诉讼的威胁来索取钱财，甚至包括那些不属于他们的钱财。这种力量通常还是纪律的基础，不论是在平民社会还是在军队之中。上帝同样利用它来获得人们的服从。

讨价还价的交易力量来自于一个国家可以对另一个国家施加的有

形伤害，它反映在一系列的观念上，如威慑、反击与报复、恐怖主义与神经战、核讹诈、休战与投降，乃至限制对战俘的伤害以及管理军备的互惠努力。有时军事力量无须通过劝说或者恫吓就能强制性地实现某一目标；然而在整个历史中，尤其是现在，人们通常利用军事潜力可以造成的伤害影响其他国家的政府或者人民。这种利用既可能是巧妙的，也可能是笨拙的；既能够用来实现邪恶的目的，也能够用来实现自我保护，甚至能够用来谋求和平。如果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交易力量，它便是外交的一部分——外交中较为丑陋、负面和缺乏文明的那一部分——然而，它的确是外交。

这种外交没有一个惯例的称呼。它并不是通常意指实现军事胜利的艺术或者科学的“军事战略”。当传统上胜利的目标被描述为“将一方的意愿强加于敌人之上”时，如何做到这一点通常却比战役和战争的实施较少受到重视。至少在美国，以前这种外交是例外和偶然的，不处于核心的地位，也不被持续地运用，并且当战争逼近或正在进行时，它经常会让位于军事行动。但是，在最近的 20 年，这种外交却一直处于核心的地位并且得到持续的运用。在美国，在武器的爆炸威力发生革命性增长的同时，军事同外交政策的关系也发生了一场革命。

在本书中，我试图识别出几个构成这种暴力外交基础的原则。“原则”可能是一个过于矫饰的术语，但是我的兴趣在于这一点：国家是如何将它们实施暴力的能力作为讨价还价的交易力量的，或者至少它们是如何试图这样做的？其中的困难和危险是什么，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又有哪些？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不是一个排外的或者竞争性的概念，失败更是如此。当面对暴力的时候，甚至敌对双方之间的利益也会出现重合；如果没有重合，就不存在交易，而只有针锋相对的战争（a tug-of-war）。

这不是一本关于政策的书。我无意重组北约组织、遏制共产党中国、解放古巴、挫败越共，或者阻止印度谋求核武器；我也无意支持或者贬低载人轰炸机、核动力舰艇或者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我同样无意在死

亡与投降之间作出选择,抑或对军种进行重组。原则很少直接导向政策;政策依赖于价值与目的、预测与估计,还必须经常反映出相互冲突的原则的相对重要性。(政策应当是连续的,但是令人感兴趣的原则几乎总是相互冲突的。)同时,我知道自己没有平和地掩饰自己的偏见:在某些时候,它们被明显地强加给读者;在另外一些时候,读者可能同我持有同样的看法,因而没有注意到它们;还有一些时候,我无疑过于屈从于一些不同的看法,以至于一些本不属于我的观点也被认为是我的。

我没有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着墨很多。因为在1960—1961年,我同莫顿·霍尔珀林(Morton H. Halperin)合作完成了一本关于军备控制的篇幅不长的书;我仍然很喜欢这本书,并且找不出需要在这里重述或者重写它的理由。本书也很少涉及暴动、起义以及国内恐怖主义,这些问题需要另外再写一本书。本书也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具体分析关于存在多个核国家导致的“去极化”(depolarized)世界的问题,尽管如此,我所写的那些在一个极化的世界中是有效的内容,或许在一个存在数个竞争性大国的世界仍然是有效的。它们和法国或中国的政策也是相关的,就像和美国或苏联的政策相关一样。并且,如果我所说的内容符合当前的情况,那么它也应当适用于未来,只是更加不完善而已。

我在书中使用了一些历史案例,但是它们通常是用来说明观点,而非作为证据的。在翻阅文献以寻求思路时,我发现恺撒(Caesar)的《高卢战记》是一本内容相当丰富的著作,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是最好的一本书。不论它们的历史学价值如何,即使把它们当作纯粹的小说来读,也是如此。我经常会使用最近的事例来阐明某个观点或者策略,然而此举并不意味着我赞同这些政策,即使它们取得了成功。举例来说,我用好几页分析了1964年美国对东京湾*的轰炸,但这并不表示我赞成这一政策(尽管事实上我的确赞成);我也用好几页探讨了1965年美国轰炸北越的强制行动,同样这并不意味着我赞成这

* 东京湾,即北部湾的旧称。——译者注

种做法(事实上我还不能确定);我还用好几页研究了政府最高层的那种培植非理性的策略,即使并不可信的威胁变得可信的策略,这也并不表示我赞同这一方法(事实上我不赞同)。

在写作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以致我想打破常规,让其他人不仅和我一起分享荣誉,而且同时承担责任。颇有说服力的批评家对本书的结构和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的两位是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和小詹姆斯·金(James E. King, Jr.)。出于对本书初稿作品的严重不满,更是出于对作者的爱护,他们花了巨大的精力对每一章都进行了指正。在这里我不仅要感谢他们,而且还要特别说明他们对本书依然不满意。我还要感谢那些毫不犹豫地指出我的错误所在、或者表述不清、或者书的结构安排糟糕的人,以及那些为我补充新的想法或提供案例的人。他们是罗伯特·鲍伊(Robert R. Bowie)、唐纳德·伯西(Donald S. Bussey)、林肯·布卢姆菲尔德(Lincoln P. Bloomfield)、托马斯·多纳休(Thomas C. Donahue)、罗伯特·欧文(Robert Erwin)、劳伦斯·芬克尔斯坦(Lawrence S. Finkelstein)、罗杰·菲舍(Roger Fisher)、罗伯特·金斯伯格(Robert N. Ginsburgh)、莫顿·霍尔珀林(Morton H. Halperin)、弗雷德·伊克尔(Fred C. Ikle)、威廉·考夫曼(William W. Kaufmann)、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罗伯特·莱文(Robert A. Levine)、内森·莱茨(Nathan Leites)、杰西·奥兰斯基(Jesse Orlansky)、乔治·奎斯特(George H. Quester)和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 Wolfe)。这些列举还没有能够包含那些对本书的文字和内容同样产生影响的很多人。

我还将之前发表于下述杂志和研究机构的刊物的部分论文以修订的形式整合到本书的一些章节中。它们包括:《原子科学家学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外交》(*Foreign Affairs*)、《弗吉尼亚评论季刊》(*Th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乔治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研究所以及伦敦战略研究所。我要感谢这些杂志和研究机

构允许我这样做。

在第一稿完成后，来自华盛顿防务分析研究所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的一群坚持不懈的研究人员与我一起举办了 11 次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在访问伦敦战略研究所期间，本书最终得以定稿。

1965 年春，我以前在耶鲁大学的同事们邀请我在亨利·史汀生讲坛 (Henry L. Stimson Lectures) 作系列的演讲，演讲的内容便来自本书。

托马斯·谢林

马塞诸塞州坎布里奇市

1965 年 11 月 15 日

目 录

1	丛书总序 纵谳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王缉思
1	前言	
1	第一章 暴力外交	
31	第二章 承诺的艺术	
80	第三章 风险管控	
109	第四章 军事行动的规范	
163	第五章 终极生存外交	
191	第六章 相互畏惧的动力	
227	第七章 军备竞赛的对话	

第一章 暴力外交

外交和武力之间的一般差别,不仅在于使用的工具,即到底是语言还是子弹,而且还在于敌对双方之间的关系——动机的互动以及交流、谅解、妥协和克制所具有的作用。外交就是讨价还价的交易,尽管它所追求的结果对任何一方来说都不是理想的,但是对双方来说都要好于其他一些选择。在外交谈判中,每一方在某种程度上都控制着对方所需求的东西,并且相比把它们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忽视对方的愿望,通过妥协、交换或者合作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交易可以是礼貌的,也可以是粗鲁的,既包括发出威胁,也包括给予好处,既可以维持现状也可以忽视任何现有的权利和特权,还可以采取不信任而非信任的立场。但是不论是礼貌的还是粗鲁的,建设性的还是侵略性的,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也不论是发生在朋友之间还是对手之间,以及不论是否存在信任和友好的基础,只要双方试图避免相互破坏,以及认识到需要让对方选择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结果,就一定会有一些共同的利益。

假如一个国家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它可能就不再需要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了。它可以通过纯粹的实力、技巧和智谋来获取它所需要的物品,并继续保留已拥有的物品。它可以强制性地实现这些目标,仅仅需要考虑敌人的力量、技巧和智谋,而不需要迎合它们的愿望。国家可以强制性地击退和驱逐、进犯和占领、俘获和剿灭、解除武装和使之丧失能力、限制行动和阻止进入以及直接挫败入侵或攻击。如果它有足够的力量,它就能够实现上述目标。是否“足够”取决于对手拥有多大的实力。

武力还可以完成一些其他的较少军事性、英雄式、无人情味以及单

边的目标。这些目标更加丑陋，在西方的军事战略中也较少获得重视。军事力量在实现夺取、持有、解除武装、限制、渗透和阻碍等目标之外，还可以被用来造成伤害。除了用于获得和保护有价值的东西之外，它还可以用来破坏价值。除了在军事上削弱敌人之外，它还可以使敌人遭受巨大的痛苦。

作为战争的结果，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时则是极度地——出现痛苦和震惊、损失和悲伤、困苦和惊恐。然而在传统的军事科学中，这些只是战争的副产品，而不是战争的目标。但是如果暴力可以是附带产生的，那么它也可以被刻意地制造。伤害性力量就可以被视为军事力量最突出的属性之一。

与强制性的夺取或者自卫不同，伤害并不是毫不关心他人的利益。伤害的大小可以通过它能够造成的痛苦，以及受害者试图避免这种痛苦的迫切性来衡量。强制性行动针对的对象可以是杂草、洪水或者军队，但是痛苦要求必须有一个受害者，他能够感受到疼痛或者拥有某种可能会被夺去的东西。施加痛苦不能直接获得或者挽救任何东西，它只能促使人们努力避免被施以痛苦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它唯一的目的，除非是为了娱乐或者报复，否则必然是影响他人的行为，并迫使其作出决定或者选择。为了用于强制，暴力还必须是可以被预测的，而且它必须是通过和解可以避免的。伤害性力量是讨价还价的交易力量。利用这一力量便产生了外交——手段恶劣的外交，但的确是外交。

武力与强制之间的差别

主动获取与迫使他人给予、抵御攻击与迫使他人不敢攻击、防止他人夺取与迫使其不敢夺取、被他人强制性地夺取与主动放弃以避免风险或者破坏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这是防御与遏制、武力(brute force)与恫吓、征服与敲诈、行动与威胁之间的差别。这是单边的、依赖于实力的“非外交”(undiplomatic)行动与建立在伤害性力量基础上的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之间的差别。

两者之间存在几个方面的不同。武力行动的“军事”或“非外交”活动关注敌人的力量,而非它的利益;用于强制的伤害性力量则充分地利用敌人的需求和恐惧。武力通常通过与敌人的实力的比较来衡量,两者直接对立。而伤害性力量一般不会被敌人的伤害性力量所削减。对立的实力可以相互抵消,然而彼此造成的痛苦和悲伤却不能。虽然施加伤害的意愿、威胁的可信性,以及运用伤害性力量的能力确实取决于对手反过来能够造成多少伤害,但是对手的痛苦和悲伤很少或者不会直接减少本方的痛苦。敌对双方不可能同时利用优势力量战胜对方,但是它们却可以同时伤害对方。通过伤害性力量,它们能够对具有价值的目标提出质疑,并通过纯粹的暴力将其摧毁。

武力只有当它被使用时才会成功,而伤害性力量当它蓄势待发时则是最成功的。伤害性力量是一种施加破坏或者更大破坏的威胁,它将迫使对手屈服或顺从。这是一种影响他人决定的潜在的暴力——既可以被保留也可以被施加的暴力,或者受害者认为可以被保留或施加的暴力。伤害的威胁试图塑造他人的动机,而武力则试图战胜对手的军事力量。不幸的是,伤害性力量经常需要通过一些表现方式来传达给对方。不论是试图导致他人作出非理性反应的恐怖暴力,还是试图劝告他人相信你的意图以及你可能会再次这样做的经过周密考虑的暴力,其目的都不在于造成的痛苦和破坏本身,而在于对他人行为的影响。如果伤害性力量能够完全实现其目标,它所希望出现的结果是,他人将会作出出现更多暴力的预期。

为了利用造成伤害和施加破坏的能力,就需要知道对手珍惜的是什么,什么将使他感到害怕,需要使对手明白自己的何种行为将导致对其施加暴力以及何种行为将使得暴力的实施得以抑制。受害者必须知道何种行为是受欢迎的,何种行为又是不受欢迎的。痛苦和灾难的发生必然视其行为而定,威胁不仅应当是有效的——如果拒绝服从,将招致痛苦或者损失——而且还应当有相应的保证,可以向他暗示,如果他确实屈服,就可以避免痛苦和损失。必然死亡的前景可能会令对手震

惊,然而这样的前景使他别无选择。

利用威胁造成破坏来实施强制时,我们同对手之间的利益不能是绝对相反的。如果对手的痛苦是我们最大的快乐,而反过来,我们的满意是对手最大的不幸,那么彼此将只会着手去伤害和挫败对方。只有当与对手能给我们带来的收益相比,他的痛苦很少或者根本不会给我们带来满足时,以及令我们满意的行为给对手造成的损失比我们能够给他造成的伤害更少时,强制才有实施空间。为了实施强制,需要与对手展开交易,并使其认识到按照我们的愿望行事将获得最好的结果——不按照我们的愿望行事将导致最坏的结果。

和大部分严重的劳工纠纷、种族冲突、市民暴动和镇压、敲诈等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是实施纯粹破坏(pure damage)或纯粹暴力的能力。然而我们在应对这些犯罪时,通常使用的是伤害性力量,而不是残酷的暴力(brute violence);对于不当行为,我们通过事后惩罚或者威胁惩罚来加以避免,而不借助于电网、高墙及全副武装的警察实施保护。当然,监狱既可以是为了强制性的监禁,也可以是为了威胁剥夺自由;如果设置监狱的目的是通过监禁使罪犯无法为害,那么收监服刑的人数越多就意味着越成功,但是,如果目的是威胁剥夺自由,那么则是人数越少越成功。这种情况下,成功取决于主体对后果的理解。当一辆汽车执意霸占道路,或者极力争取正当的分享权利,或者在十字路口坚持首先通过时,它所作的威胁正是一种纯粹破坏。一辆坦克或者推土机能够不顾他人强行通过;我们则不得不威胁要进行破坏(通常是相互的破坏),使其他司机出于爱惜他的车辆和顾及自身的安全而作出让步。当然,上述这种纯粹破坏的威胁并不适用于无人驾驶的汽车。

强制与武力之间的区别既反映在意图上,也反映在手段上。搜寻并灭绝科曼奇人(Comanches)是武力的运用;袭击他们的村庄以使其顺从则是基于伤害性力量的强制外交。印第安人的痛苦和损失也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目的和效果不同。如果印第安人被杀死是因为他们阻挡了道路,或者某人想夺取他们的土地,或者当局认为他们不可归

顺并难以限制于是决定予以灭绝,那么这就是纯粹的单边暴力。但是,如果杀死一部分印第安人是为了使其他的人顺从,那么这就是强制性暴力——不论它是否有效。德国人在凡尔登可怕的“绞肉机”(meat-grinder)战役中认为,他们自己在吞噬成千上万的法国士兵。如果以清除军事障碍为目的——法国步兵被当作军事“资产”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那么在凡尔登的进攻就是一场单边的军事行动。相反,如果目标是使法国人为失去年轻的男人——不是客观的“士兵”,而是儿子、丈夫、父亲以及法国男性的尊严——而感到痛苦以至于无法忍受,最终将投降视为受欢迎的解脱,也因此破坏联盟胜利的前景,那么这是一项旨在使和解更易接受的强制行动。当然,任何的武力运用都往往是残忍、轻率、报复或者完全顽固的,其动机本身也是复杂和混乱的。英雄主义和残忍行为既适用于强制外交也适用于纯粹的武力较量,这一事实使得当某种强烈的进取心被调动起来时,将无法根据这一因素区分强制与武力,也无法明确这两种战略的差异。

武力与强制之间的区别可以通过成吉思汗的两种战略得到阐述。早期他坚持蒙古人的战争信条:被征服者永远不会成为胜利者的朋友,因此消灭被征服者对于胜利者的安全是必要的。这是一种单方面消除威胁和推卸责任的做法。根据林恩·蒙特罗斯(Lynn Montross)的观点,在成吉思汗发现如何运用伤害性力量实现外交目的后,他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伟大的可汗,不受常规仁慈的限制,强迫俘虏——妇女、儿童、年长的父亲、心爱的孩子——走在部队前面作为敌人发起抵抗时率先的受害者。”¹活着的俘虏经常证明比死了的敌人更有价值。成吉思汗在他壮年时采用的这一方法在当代仍然是常用的。人质是伤害性力量最为纯粹的形式。

战争中的强制性暴力

在现代战争中,无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假定的还是实际的,伤害性力量与强制夺取或维持之间都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异。长期以来,

虽然希腊和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可以不定期地给对方造成伤害,然而任何一方都无法强制地达成获取或维持的目标,也无法依靠有形的手段使自己免于暴力攻击。20世纪40年代末,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虽然无法驱逐英国人,但是他们通过恐怖主义对敌人造成伤害和引发恐惧,使其丧失斗志,并最终影响了某些人的决定。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残酷战争更多地是纯粹的暴力而不是军事力量的竞争,结果取决于哪一方首先因为无法继续承受痛苦和屈辱而先行屈服。法国部队希望并确实试图使这场战争成为一场力量的对决,即以军事力量对抗民族主义者制造恐怖的能力,灭绝或使民族主义者丧失战斗力,将他们与其暴力的受害者隔离开。然而由于在内战中恐怖主义分子通常可以通过纯粹的身体接近靠近受害人,所以这些受害人及其财产并不能被有效地保护起来,最终法国部队选择诉诸一场不成功的伤害战争。

没有人会相信苏联人能够在我们手里夺走夏威夷、纽约或者芝加哥,但是也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有能力摧毁这些地区的建筑和伤害这些地区的人民。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虽然苏联人是否能占领联邦德国是存在疑问的,但是他们有能力严重地破坏联邦德国则是毋庸置疑的。美国被普遍认为有能力摧毁苏联的大部分国土,但是反过来,美国是否能够避免被严重地破坏甚至毁灭,或者在它破坏苏联的同时避免西欧遭到毁灭,这些至少是有疑义的。我们能够占领苏联并使用其经济资产,这几乎是不成问题的,除非苏联威胁将制造灾难或者愿意屈服。目前,伤害性力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力量,已经成为我们最引人注目的军事能力。我们虽然将一个政府部门命名为国防(defense)部,但是强调的却是报复(retaliation),即“以恶制恶”(to return evil for evil)。同样,痛苦和暴力,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武力,已经成为当前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军事能力的基础,例如塑料炸弹(plastic bomb)、恐怖分子的子弹、被烧毁的农作物以及被折磨的农民。

战争看起来更多地是(或者威胁成为)一场忍受、紧张、固执及痛苦的较量,而不是一场武力的对决。战争更多地是(以及威胁成为)一个